

刘大櫟对韩愈散文的接受

全 华 凌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在清代桐城派散文中,刘大櫟文论思想上承方苞,下开姚鼐,是清代散文理论定型的关键部分。刘大櫟乐于学习古人,博学约取,尤其推崇韩愈散文,汲取了韩文尚奇、尚变、文从字顺的散文主张,发展了韩文气盛言宜、古文文法、审美趣味的观点,最终提出的“神气、书卷、经济”的散文创作主张并致力于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这一主张启发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的散文观,对后世散文创作意义深远。

[关键词] 刘大櫟; 韩愈散文; 吸取; 发展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6-0097-05

刘大櫟是清代散文第一大流派桐城派“三祖”之一,上承方苞,下开姚鼐,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关键人物。刘大櫟沿袭桐城派鼻祖方苞恪守“六经”、师法唐宋古文名家的治学理念,颇多创新发明,对促进姚鼐完成桐城派散文理论体系“义理、考据、词章”的建构,居功甚伟。

—

清代学者方宗诚在《记张皋文著柯文后》说:“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抱之识,天壤者,以同得古人之心也。”^[1]谓方望溪、刘海峰、惜抱轩先生三人虽同为桐城三祖,实际各有擅长,望溪长于学问,海峰优于才干,而姚鼐则见识超卓,但都重视研究古人,也擅长学习古人。桐城三祖都重视研究和师法韩愈散文,尤以刘大櫟为甚,方苞认为刘大櫟“乃今世韩、欧才也!”^[2]。刘大櫟的散文理论长篇《论文偶记》比较系统论述了散文的审美标准,对韩愈散文理论有深入的汲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对韩愈散文创作尚奇取向的推崇

刘大櫟曰:“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

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奇正与平相对。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刘大櫟《论文偶记》)

刘大櫟把散文之奇分为“字句奇、意思奇、笔法奇、丘壑奇、气奇和神奇”从低到高六个层面,认为字句之奇是散文奇特美学标准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文章只停留在字句之奇层面,则“不足为奇”,气奇才是“真奇”。大櫟思接千载,纵观散文发展史,只认可司马迁、扬雄和韩愈之文为奇,不过他认为韩愈散文之奇也对扬雄《太玄》《法言》有所借鉴和吸收,“故昌黎文奇”。大櫟对韩愈散文奇特审美取向的推崇,立论的着眼点很高,认为韩愈的文章是“文奇”,文奇是对韩愈散文总体审美取向的定性,不仅包括字句奇,也包括意思奇,笔法奇,丘壑奇和气奇。也就是说刘大櫟认为韩愈散文在追求奇特审美标准上达到了至高的境界。

(二)对韩愈散文尚变审美取向的推崇

刘大櫟曰:“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3]349}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刘大櫟《论文偶记》)

刘大櫟对韩愈散文尚变化的审美取向十分推崇,认为古代文章家中能把尚变的创作艺术追求一

[收稿日期] 2019-12-16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韩愈散文接受对古代散文理论定型之影响研究”资助(编号:11YBA270)

[作者简介] 全华凌(1967-),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以贯之、自然运用、臻于炉火纯青境界的只有昌黎韩愈了。韩愈的散文类型丰富,无论同类型文章,还是不同类型的文章,都是一文一面,绝无雷同,与唐宋时期其他七大家的散文笔法比较,追求不同,崇尚变化的确是韩愈散文突出的总体特点,清代学者储欣评韩愈散文《送孟东野序》“历叙古来著作,然以孟郊东野之诗继之。闪烁变化,鬼怪惶惑,其妙处公自言之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卷首)蔡世远评韩愈散文“至其文之变化离奇,独出格调,尤令人有舞蹈之乐。”(《古文雅正》评论卷七)而刘大櫟对韩愈散文尚变艺术特色的评价是“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凡研究韩愈散文者,没有不熟读韩文的,要说韩愈散文真正达到了“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这种变化奇幻的境界,在韩愈的碑志文、杂文中的确可见证,但其他散文未必见得就都达到了“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的高妙境界。是不是刘大櫟读不懂韩愈散文在说瞎话呢?也不是。毕竟碑志文和杂文是韩愈散文的主体,这两类散文最突出的审美特色是奇幻变化,那当然也可以看做是韩文的特色了。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刘大櫟借评论韩愈散文尚变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散文书写要尚变,要做到形式上“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还要做到神韵上“神变、气变、境变”,这样才算都达到了散文书写变幻奇妙的化境。不仅如此,刘大櫟还引经据典,所谓“虎变文炳,豹变文蔚。”(《易经》)意思说:“老虎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光亮,豹子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鲜丽。”以自然界两种猛兽老虎和豹子皮毛色泽的变化给人带来震撼的美感,寄寓事物变化才有生机和新的景象。还从语义学角度阐释了文章之文的词意,所谓“物相杂,故曰文。”杂者,变化之谓也。所以刘大櫟概括说:“故文者,变之谓也。”

(三)对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推崇

刘大櫟说:“文贵去陈言。昌黎论文以去陈言为第一义。后人见为昌黎好奇故云尔,不知做古文无不去陈言者。试观欧、苏诸公,曾直用前人一言否?昌黎既云去陈言,又极言去之之难。盖经史诸子百家之文,难读之甚熟,却不许用他一句,另做一番言语,岂不难哉?”(《论文偶记》)刘大櫟主张散文创作“贵去陈言”,是以韩愈散文创作主张为旗帜的,所谓“昌黎论文以去陈言为第一义。”韩愈散文创作毕生坚持词必己出,昌黎在《樊宗师墓志》说:“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李习之师承韩

愈,其论文“以创意造语为宗”。何为创意造语呢?刘大櫟理解为:“如春秋之意不同于《诗》,《诗》之意不同于《易》,《易》之意不同《书》是也。所谓造言者,如述笑哂之状,《论语》曰莞尔,《易》曰哑哑,《谷梁》曰灿然”,“后世作文,凡言笑者,皆不宜复用其语。”(《论文偶记》)《诗》《易》《书》是三本不同的书,文体各异,分别为诗歌、哲学与历史著作,出自不同时期不同人之手,其书立意不同,文体风格不同,语言风格自然也会不同。刘大櫟强调文章、著作立意的独创性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历叙前人对嘲笑的表情,非各人要不相同,显然有些形式主义。从古至今,汉语词汇有限,而语言运用表达无限,叙述、描写、说明、议论同类事物非要用完全不同的字词来书写,那是办不到的,也没有谁达到过这个标准。文章的独创性,主要表现为立意的独特性,语言表达方式与风格的独特性,而不应该用字的不同。刘氏在这一点上强调得有点不切实际,也与昌黎韩愈原意不符。

二

刘大櫟对韩愈散文的接受,在吸收的基础上有发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对韩愈散文创作“气盛言宜”主张的发展

韩愈在《答李翊书》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强调“气盛”与“言”“声”的关系,认为“气”是“言”与“声”的主宰,一旦“气盛”了,其“言”与“声”就自然会适宜了。韩愈清楚一个作家之“气”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盛大醇正,必须养。韩愈说:“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韩愈《答李翊书》)

如何养气呢?韩愈认为,一个作家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要求,必须不断地学习领悟儒家经典要义,必须终生矢志不渝地坚持,这样养气才可能达到盛大醇正的境界。刘大櫟在《论文偶记》中深入地谈到散文创作的“气”与“神”的关系,所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

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论文偶记》)刘大櫟认为“神为气之主”,强调写文章要以精神为主,气韵为辅。刘大櫟虽然肯定“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没错,但认为“神”是散文创作中处于最高层次的一种修养,有神才会有气,神不同气也不同,主张作文之道要“气随神转,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

刘大櫟在《论文偶记》中所强调的“神”实际与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所论的“气”有异曲同工之妙,韩愈强调“气”要养,才能醇正盛大,也就是说散文写作者各人有各人的气,就像曹子桓所谓的“气”有清有浊一样,而刘大櫟所论“神”有“远、伟、变、深”四种情形,就对应曹子桓所论“气”有“清、浊”之分和韩愈所论“气”需要养才“醇”的观点。不过,刘大櫟对韩愈“气盛言宜”观点的发展,表现在对“神”的深入探究,从作者种种之“神”中遴选出四种富有审美趣味“远、伟、变、深”与作文之“气”四种境界“逸、高、奇、静”对列论述,品味透彻,立论精当。认为“神”与“气”的本质关系为“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揭示了“神”与“气”的内在联系。并且认为散文作者“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一个“势”,则把文章之“神”与“气”总揽了起来。在刘大櫟看来,“神”是散文创作的主脑,“气”是散文创作“土木材料”,而“势”则是作文最后的总体效果。刘大櫟所论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实有超越前人之处。

(二)对韩愈散文创作之法的发展

韩愈教导时人和后学,反复强调学习古人文章的目的是“好古道”,其《答陈生师锡书》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4]731}其《答李图南秀才书》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4]725}韩愈向陈生与李图南反复申说自己好读古书的目的是喜欢古人文章的语言和道理,比较起来,更喜欢古人的道理。韩愈读古书,学习古人,重视“古道”,其散文创作更倾心阐明“古道”,其在《谏臣论》说:“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4]469}韩愈把散文创作看得与为国立功一样重要,也明确散文创作的基本方法是“修其辞以明其道”。这里韩愈只是给时人后学指明了学习与创作的基本方向,即要加强语言、修辞的修炼,目的是用独特优美的语言来阐明“古道”。韩愈这种学习与创作的方法很宽泛,也很灵活,门径不很清楚,对禀赋一般的学者缺乏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刘大櫟看到了韩愈上述观点对指导学者写作散文实践上的缺陷,其在《论文偶记》中作了发挥和补充。刘大

櫟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3]348}刘大櫟认为读古书的终极目标是学习古人文章的写法,对于如何学习和应用古人的写作方法是有讲究的,刘氏认为古人的写作方法有“死法”和“活法”,后人学习和应用,不能徒守“死法”,而应领会和运用“活法”。何为“死法”呢?又何为“活法”呢?刘大櫟把散文创作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神气”“音节”“字句”,认为“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论文偶记》)刘大櫟认为学习古文,评论古文,创作散文,必须神气、音节、字句三者兼备,这才是抓住了古人文章的精神和妙诀,才算得上领会和把握了古人文章的“活法”,否则,如果只在字句上下功夫,那就是“死法”。刘大櫟认为写文章,“死法”与“活法”只是一墙之隔,一步之遥,徒守字句是“死法”,而单单懂得神气的重要性也难成“活法”,那如何才能把握文章写作的“活法”呢?刘大櫟认为“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论文偶记》)这里,刘大櫟比较清晰地描述了神气、音节与字句的关系,详细讲明了如何通过严守音韵规则使散文的字、句、章、篇达到神气活现的艺术效果。刘大櫟这番论述把韩愈提倡的“修其辞以明其道”的囫圇写作理论明确了,这种指导散文写作的方法不仅新颖,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对韩愈散文审美趣味的发展

韩愈散文创造了雄奇之美,后人多所评赞,如苏洵赞韩愈散文“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嘉祐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卷十)苏舜钦赞韩愈散文“悲激顿挫,有骚人之思”。(《苏舜钦集·答马永书》卷十)刘大櫟很赞赏韩愈散文的雄奇,赞叹道“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与雄处。”(《论文偶记》)刘大櫟认为韩愈的散文在审美趣味上,表现为“雄处多,逸处少”。“雄”与“逸”是两种区别明显的文艺审美特征,这两种审美特征为韩愈散文兼有,但韩愈并没有把它提炼出来,或许韩愈创作散文更注重“明

道”,而淡化了对文辞审美的关注,因而他的散文理论特别专著于“文以明道”。刘大櫟在仔细研读韩愈等古人文章后,提炼了文章创作要注重“品藻”的观点,在《论文偶记》说:“文贵品藻,无品藻便不成文字。如曰浑,曰浩,曰雄,曰奇,曰顿挫,曰跌宕之类,不可胜数。然有神上事,有气上事,有体上事,有色上事,有声上事,有味上事,须辨之甚明。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刘大櫟这段话对古代散文的审美特征作了详细的品鉴,把古代散文的总体审美特征分为“浑、浩、雄、奇”四类,对散文笔法归纳“顿挫、跌宕”两类,并认为散文四类总体审美特征、两类散文笔法又表现在神、气、体、色、声、味六个方面。可见,刘大櫟对散文审美特征和散文笔法的品鉴是精深而独特的,对后世认识散文的美学特征不无启发。

三

刘大櫟在汲取、发展韩愈散文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以注重“义理、书卷、经济”^{[3]348}为内核的散文理论体系。刘大櫟这个理论体系既继承了方苞重“义理”的主张,又有自己的发明,“书卷”“经济”包含了“神气、音节、字句”三位一体的理论结构。刘大櫟不仅重视散文理论的发掘、整理,同样重视理论的应用,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刘大櫟主张散文创作要“辞由己出”,其散文作品能体现这一特点。刘大櫟一生勤于笔耕留下散文近200篇,有论辩类散文23篇,序跋类散文55篇,传状碑志类散文72篇,山水杂记散文28篇,书信类散文10篇。刘大櫟“辞由己出”的散文主张是对韩愈“文从字顺”“贵去陈言”观点的继承,在散文写作中,海峰贯彻自己这一主张。古人论天道的文章很多,刘大櫟也作了《天道》(上、中、下),提出了“生者自生,而天究不知其所生;死者自死,而天究不知其所以死邪;贵者自贵,而天不知其贵贱者自贱,而天不知其贱邪?”^[5]的观点,认为人物、山川、日月、天地等天下万物的生死贵贱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万物“相与回薄于宇宙之间”,天道浑然不觉。与五代冯道的“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的《天道》思想和戴震的“气之流行,生生不息,谓之道。”(《孟子字义疏证》)表达的思想虽然一脉相承,但刘大櫟的天道观体现了一种天地间万物相互联系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比冯道和戴震的思想更为深刻,书写方式与冯、戴截然不同,体现了海峰自己主张的“辞由己出”的理论品质。

其二,刘大櫟主张“文章最要气盛”^{[3]348},认为好文章应该“奇气”激荡,其说理、杂传类散文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杭世骏之《词科掌录》中引吴文恪《赠刘生诗》,有“生名大櫟其姓刘,意气横绝凌九州”句,道出了海峰其人其文气盛的特点。“气盛言宜”这一观点出自韩愈,刘大櫟主张“文章最要气盛”是汲取了韩愈的观点。在《论文偶记》中,刘大櫟用很长篇幅论述文章之气这一问题,其主要从“气”与“神”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美文应该在“起灭转接之间”要有一股“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奇气”。在散文创作实践中,刘大櫟一生都在追求写美文,贮奇气,其杂记、写景、论辩类散文莫不能体现行文“奇气”激荡的特点。《骡说》是一篇说理散文,颇具这一特点,其文说:“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谓贱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于其心,而坚不可拔者,世之所谓贵者也。然则马贱而骡贵矣。”文章从马贵而骡贱,到马贱而骡贵,“起灭转接”,大开大阖,大起大落,而读之不觉唐突,反而觉得奇气横生,令人联想起傲世轻物一类人物,傲骨嶙峋,不可迫近,是作者品性的传神写照。其《乞人张氏传》为乞丐立传,并盛赞乞丐张氏“近世以来,天地之气,不钟士大夫,而钟于穷饿行乞之人。”文中写乞丐张氏终身行乞不曾嫁人,颇有风节。批评缙绅之家往往并无德行,不如行乞之人,肯定了卑贱的行乞者,鞭挞了身处高位者。文章为一乞者立传已经奇特,但更奇特的是乞者张氏风节居然还在道貌岸然的缙绅阶层之上,细读深思,不仅觉得道理天然,揭示现实入木三分,更觉有一股奇气在作者心中激荡,也在文中激荡。

其三,刘大櫟主张文章应“神气、音节、字句”有机结合,其文力求字句、音节与神气的妙合,体现这一艺术特点。其说理文《息争》从孔子传授学生科目之杂;批孟子攻杨墨之失;论“天地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不可以一端尽”;最后得出孔子因其心“恢然有余”“而于物无所包”,以至于“大而无外”。文章立意高远,心胸开阔,纵观历史,洞察现实,思维穿行于社会与自然之中,纵横捭阖,语言骈散结合,字句音韵得宜,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以字词为载体、音韵为媒介、神气为灵魂的创作理念。又《送姚姬传南归序》同样体现了刘大櫟注重“神气、音节、字句”散文一体的创作观。姚姬传,即姚鼐,属刘大櫟晚辈学生,因聪颖过人,博闻强识,成名早,以至于成名辞官归来,刘大櫟还未显达。文章立意奇,

开宗明义“古之贤人,不待壮而其道已成”,接着说到姚姬传少年成名,文武双全,再说到姚氏礼部应试不第。可谓全文平中见奇,语言虽平易,然传主奇异,年少早慧,少年成名,文章了得,且武功不凡,照理说应礼部试会较顺利,但偏偏落第,话外之意显露,当时科举考试弊端严重。细读全文,语言参差错落,音韵铿锵,作者对姚氏的赞和对时局的恨了然纸上,爱憎分明,奇气磅礴,灌注全篇。

在桐城派的三位散文大家中,刘大櫟游于方苞之门,深得方苞为人为文的心法,又是姚鼐的老师,其散文理论与创造成就在桐城派中承先启后,甚为关键。刘大櫟论文,强调学习古人,对韩愈等古人文章极力推崇,又擅长推陈出新,其《论文偶记》提出

了“神气、书卷、经济”的散文创作主张,启发了惜抱轩,对今天新时期散文创作还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叶朗.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27.
- [2] [清]姚鼐. 惜抱轩文后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57.
- [3]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4] [唐]韩愈.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 刘真伦,岳珍,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5] [清]刘大櫟. 刘大櫟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

On Liudakui's Acceptance of Hanyu's Essays

QUAN Hua-l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essayists of Tongcheng School in Qing Dynasty, Liudakui's literary theory inherited Fanbao and Yaoding, which is a key part of theories of essays in Qing dynasty. He takes pleasure in learning his predecessors, especially recommends Hanyu's essays, from which he absorbs characteristics of Hanyu's essay—pursuing peculiarity, change and nature. He develops grammar of ancient prose and aesthetics in Hanyu's essays and raises views of spirit, volume and economy while creating essays. This idea inspires Yaoding to put forward to his views of essays—theory, evidence and composition which exer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prose creation.

Key words: Liudakui; Hanyu's essays; absorb; develop